

# 从“压力叙事”到“赋能治理”：“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转型与战略重构

白 旭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9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8日

## 摘 要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减量治理、老龄化从中度迈向重度的关键转折期。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冲击，形成了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压力叙事。本文系统整合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从“压力叙事”向“赋能治理”的范式重构。研究发现，“十五五”期间中国面临人口总量缓降、老龄化加速、抚养比历史性反转等多重结构性压力，但压力之下也催生了银发经济集聚、老年人力资本提升等赋能契机。本文构建了“赋能治理”的理论框架，从经济、社会、空间、认知四个维度阐述战略重构路径，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具建设性的理论视角。

##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压力叙事，赋能治理，“十五五”时期

# From “Pressure Narrative” to “Empowerment Governanc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ic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Xu B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2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8, 2026

**文章引用:** 白旭. 从“压力叙事”到“赋能治理”：“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转型与战略重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219-226. DOI: 10.12677/ar.2026.139648

## Abstract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s it shifts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management of decline, and as aging progresses from moderate to severe. Existing studie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s of aging, forming a narrative centered on "risk contro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proposes a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from "pressure narrative" to "empowering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faces multiple structural pressures, including a gradual decline in total population, accelerated aging, and a historical reversal of the dependency ratio. However, under these pressures, opportunities for empowerment also emerge, such as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silver economy and enhancement of elderly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mpowering governance", elaborating strategic reconstruction paths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nomic, social, spatial, and cognitive, providing a more construc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Stress Narrative, Empowerment Governance,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发力期,也是人口发展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五年。这一时期,中国将首次经历完整的人口负增长规划期,总人口持续缓降,预计至2030年将跌破14亿[1]。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化,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2.0% [2]。更关键的是,“十五五”期间老年抚养比将历史性地超越少儿抚养比,社会抚养压力的重心已从“抚幼”全面转向“养老” [1]。在供给侧,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青年就业面临代际挤压;在空间维度,农村“先老、更老、空老”格局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

在结构性转型的多重背景下,学术界围绕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与影响存在诸多争论。传统的“压力论”认为,老龄化会通过压缩劳动供给、减缓创新步伐等途径制约经济增长[3];但“积极老龄化”视角则指出,老龄化亦能通过推动技术升级、催生银发产业而释放正向激励效应[4]。这一分歧实质上表明,当前以“负担”为核心理念的治理框架,已不足以回应当下老龄社会愈发复杂的动态演变。此外,养老服务供给正处在从“福利补缺”向“福利重塑”过渡的承压阶段,而社会层面共识的薄弱——如政策认知偏离实际、积极老龄观尚未深入人心、代际责任划分不明——进一步阻碍了国家战略的有效贯彻[5][6]。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赋能治理”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如何从被动应对的“压力叙事”转向主动作为的“赋能治理”,并梳理其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 2. 结构性转型压力: 起点与基础

“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到减量治理、从中度老龄化向重度老龄化加速演进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在总量、结构、劳动力和空间分布等多个维度同时爆

发的复合性压力，构成了传统“压力叙事”的现实基础。

从总量与结构看，“十五五”时期是中国首个完整的人口负增长五年规划期。这一历史性转折与长期低生育率深度耦合，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在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处于最低行列。少子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互强化，形成“一减一少”的双重收缩格局。从底部看，新生儿数量持续走低，小学适龄人口五年间预计下降近三分之一；从顶部看，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正大规模步入老年期，推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膨胀。这种“底部塌陷”与“顶部膨胀”并存的格局，使得人口年龄金字塔加速从“扩张型”向“收缩型”演化。

从老龄化内部结构看，中国从中度老龄化迈向重度老龄化的过渡仅用时约 12 年，较发达国家平均用时少近 20 年[7]。更具挑战性的是内部结构分化：低龄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可能；但高龄老年人口增长迅速，预计 2050 年将突破 1 亿，且失能半失能比重较高[1]。“十五五”期间老年抚养比将历史性地超越少儿抚养比，这一反转深刻影响着社会总需求构成——养老支出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即期消费形成抑制[8]，而抚幼支出则兼具投资属性和消费拉动效应。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变化对内需动力的“结构性抑制”开始显现。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缩减，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多元。在技能层面，人口老龄化正迫使企业加快推进技术替代进程，使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技能偏向”特征，从而挤占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9]。从代际层面观察，较晚出生队列的就业比率逐代走低，中年劳动者在核心职位上形成明显的“岗位滞留”，对年轻群体的薪酬增长与晋升通道产生结构性挤压[10]。青年劳动力被迫向涉老服务领域流动，而高技术行业中青年的占比反而有所下降，这不利于其长期的职业技能提升和人力资本积淀。

在空间分布和认知维度上，老年人口的地理分布严重失衡。以县域为单位，老龄化格局呈现“东北—西南”走向，东北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带的老龄化率上升最为迅猛[11]。城镇与乡村之间出现显著的老龄化“倒挂”现象，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远超城镇，同时还面临青壮年外流加剧、公共养老服务不足等叠加困境。社会认知层面，“积极老龄观”尚未获得广泛认同，老年人仍普遍被视作“社会负担”而非可用资源[6]。同时，老龄化通过压低劳动报酬份额、拉大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并进一步放大了社会焦虑情绪。这种认知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使政策制定与公众理解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意义断层”。上述多重压力共同构筑了传统“压力叙事”的现实根基，也倒逼我们转向一种以“增能”为导向的治理路径。

### 3. 理论转向：从“压力叙事”到“赋能治理”

#### （一）“压力叙事”的理论局限

人口老龄化确实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攀升、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医疗服务需求激增等客观挑战[12]。这些压力都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也是不能回避的。“压力叙事”的价值在于，它最早系统地揭示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风险预警。然而，“压力叙事”的局限不在于它“看到了压力”，而在于它“只看到了压力”[13]——它将老龄化简化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非一个需要被“适应”和“转化”的常态[14]。超越“压力叙事”从而提出“赋能治理”，并非是简单否认压力的存在，而是拒绝被压力所定义。“赋能治理”正是在充分承认上述客观压力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回应方式：它不回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事实，但主张通过技术升级和人力资本开发来对冲这一趋势；它不否认老年抚养比攀升带来的财政压力，但主张通过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将“抚养成本”转化为“增长动力”；它不忽视农村“先老、更老、空老”的现实困境，但主张通过适老型农业和互助养老激活农村内生资源。简言之，“赋能治理”不是对“压力叙事”的简单否

定,而是对其的辩证超越——在承认压力中寻找杠杆,在直面挑战中发现机遇。

这一叙事在学术界有广泛基础,大量研究证实老龄化通过劳动供给萎缩、创新放缓、消费需求不足等渠道抑制经济增长[3][8]。然而,“压力叙事”存在三个内在局限。

第一,静态视角。它将老龄化视为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冲击,忽略了经济主体会主动调整行为来适应和应对这一变化。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和自动化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倒逼效应”恰恰是老龄化催生技术进步的机制[9]。将老龄化单纯视为“压力”,实际上遮蔽了其作为“催化剂”的另一面。

第二,忽略主体能动性。压力叙事倾向于将老年人群体同质化为“被抚养者”和“负担”,而事实却是:农村老龄人口大部分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形成“农村生产性老龄化”这一独特现象,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获得收入,持续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15]。

第三,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社会普遍接受“老龄化 = 负担”的叙事时,对老年人的歧视和排斥会被合理化,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被压缩,其人力资本被闲置,最终使老龄化真的变成“负担”[6]。超越压力叙事,并非否定压力的存在,而是拒绝被压力定义,转而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应对压力、激活潜能、塑造未来的新范式。

## (二) “赋能治理”的理论基础

“赋能治理”范式的提出,建基于近年来学术界对老龄化经济效应的新发现。首先,老龄化并非单向地抑制增长。研究发现,得益于老年群体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升,老龄化在现阶段对人均GDP反而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且这一效应会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而增强[4]。其次,老龄化能够“倒逼”深层次的结构优化。在劳动力供给趋紧的压力下,企业倾向于以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推动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这一过程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能抑制技能溢价、缓解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压力[9]。再次,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并非线性负相关。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代际再分配与养老储蓄可以形成“同向增长”,养老储蓄投资和老年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到2035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达到0.54个百分点[16]。此外,“适老型农业”的探索表明,通过技术适配和制度创新,老龄农民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17]。这些发现共同表明,老龄化不仅是压力,更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杠杆。

## (三) “赋能治理”与既有理论框架的对话

为进一步明确“赋能治理”的理论定位,有必要将其与国际通行的“积极老龄化”框架及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行辨析。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2年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将其定义为“优化健康、参与和安全机会的过程,以提升人们老年期的生活质量”。该框架以健康、参与、安全为三大支柱,旨在为各国政府提供制定老龄政策的宏观指引[18]。“赋能治理”与“积极老龄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超越了“老年即负担”的消极认知,都强调打破年龄壁垒、促进社会包容。然而,二者在三个关键维度上存在实质性差异。第一,分析单元不同。“积极老龄化”以个体老年人为核心分析单元,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维护、社会参与和保障获取;“赋能治理”则以整个社会系统为分析单元,关注多元主体(个体、家庭、市场、社会、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机制。第二,理论取向不同。“积极老龄化”更接近一种价值倡导和政策框架,为各国提供目标指引。“赋能治理”则更接近一种治理范式,强调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构”的治理逻辑转型。第三,行动逻辑不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积极老龄化”的行动逻辑是“赋能个体”——让老年人“有能力”参与;“赋能治理”的行动逻辑是“赋能系统”——让整个社会系统“有能力”接纳和整合老龄化。

就中国语境而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对WHO“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创造性发展,二者在概念内涵及外延、行动目标与结构特征上存在差异[12]。“赋能治理”可以视为对这一国家战略在

治理层面的具体化——它回答了“如何积极应对”的方法论问题，即将国家战略从“成本控制”转向“机遇开发”，从“压力应对”转向“系统重构”。

综上，“赋能治理”的理论贡献在于：在范式层面，将老龄化研究从“问题导向”推向“治理导向”；在概念层面，提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中层理论概念，弥合了宏观价值倡导(积极老龄化)与微观政策实践之间的理论鸿沟；在本土化层面，充分回应了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2]。

#### (四) “赋能治理”的核心内涵

综合上述理论资源，本文将“赋能治理”界定为：以系统性地激发和整合多元主体(个体、家庭、市场、社会、政府)的潜能为核心，旨在提升整个社会系统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性适应能力”的动态治理模式。这一范式包含三重意蕴。第一，赋权，即从法律、制度、政策层面保障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权利和参与机会。这包括保障老龄农民的土地经营权[17]、消除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赋权的本质是承认老年人和老龄社会其他成员都是具有主体性的能动者，而非被动接受治理的客体。第二，激活，即创造条件让被赋权的个体和组织的潜能得以释放。这包括开发低龄健康老年人的“智慧资本”和“遗憾资本”，支持其通过再就业、创业、志愿服务、终身学习等方式实现人力资本的“再制”[19]；也包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发展银发经济；还包括激活社区和家庭的互助网络，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第三，协同，即超越部门分割、主体割裂、代际对立的碎片化格局，构建系统性的联动机制。这要求在政策层面打通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社保等领域的壁垒，在空间层面统筹城乡、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在代际层面寻求“老有所为”与“青年发展”的共赢而非零和博弈。“赋能治理”把压力视为推动转型的杠杆，把老年人从“负担”重新定义为“资源”，把多元主体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

### 4. “赋能治理”的战略重构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章从经济、社会、空间、认知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从被动“压力叙事”向主动“赋能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经济赋能是基础，社会赋能是核心，空间赋能是载体，认知赋能是前提。

#### (一) 经济赋能：从“要素消耗”到“创新驱动”

经济赋能的核心是将人口老龄化从“成本负担”转化为“增长动力”。第一，激发“银发经济”的新动能。成都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经验参照。研究表明，银发经济产业集聚能显著缓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20]。成都的探索表明，规模化、集群化发展银发产业可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增长动力，但从“产业集聚”到“产业生态”的跨越，仍需在多元主体协同、消费市场激活、人才建设等方面持续突破。这意味着，通过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银发产业，可以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新的税收增长点和就业空间。具体路径包括：支持适老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发展康养旅居、老年教育、智慧健康等新兴业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银发经济生态。第二，开发“长寿红利”中的人力资本。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这一群体拥有的“智慧资本”(人生经验、专业技能、社会网络)和“遗憾资本”(未完成的梦想与兴趣)是宝贵的社会资源[19]。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弹性就业制度、老年教育平台、志愿服务体系等制度安排，可以支持活力老人实现人力资本的“再制”，从而将“抚养负担”转化为“人才红利”。农村地区的实践表明，适老型农业通过技术适配和集体统筹，使老龄农民能够继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17]。第三，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提振消费。老龄化通过“要素收入分配效应”(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扩大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8]。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从分配端入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

制，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 (二) 社会赋能：从“代际冲突”到“责任共担”

社会赋能的核心是在老龄化社会中重建社会团结。第一，重塑“家国协同”的养老责任共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文化传统为责任共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6]。在家庭层面，应通过税收优惠、照护补贴、住房支持等政策，巩固家庭的养老功能；在社区层面，发展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模式，激活邻里互助网络。南京“时间银行”的实践具有代表性作为全国较早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城市，江苏省南京市2019年启动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并于2023年升级为全市统一的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核心机制是“年轻存时间、年老享服务”，即以“时间换时间”<sup>1</sup>。经过数年发展，平台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服务网络和志愿者队伍。这一模式将无形的志愿服务转化为可量化、可兑换的“时间货币”，有效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养老资源。然而，学术研究也揭示了其运行困境：有学者从生产性老龄化视角指出，该模式在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潜能方面仍存在制度性障碍[21]；具体表现为低龄老人参与积极性不足、通存通兑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22]。这些挑战恰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主张——“赋能治理”不仅需要“赋权”和“激活”，更需要“协同”。南京“时间银行”的实践表明，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营有赖于政府制度供给、社会力量参与及跨区域通兑信用保障体系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在市场层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形成多元供给格局；在政府层面，履行兜底保障和制度供给的核心职能。这种“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责任生态，能够有效避免“国家热、社会冷”的治理悖论。第二，构建覆盖“一老一小”的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对老年人，要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支持其社会参与；对中年人，要减轻其“上有老、下有小”的照护压力，通过带薪照料假、弹性工作制等政策释放其生产力；对年轻人，要着力解决就业难、住房难、育儿贵等问题，避免其成为“被遗忘的弱势群体”[10]。第三，将“农村生产性老龄化”纳入政策视野。农村老龄人口并非纯粹的“负担”，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在从事农业生产，持续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15]。然而，这一群体面临健康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政策包容性欠缺等多重约束。破解之道在于：提高农村老龄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基本技能，优化土地产权交易方式，保障“愿耕者有其田”，创设农村社会经济活动拓展参与机会，破除身份和年龄歧视构建老年友好型农村社会。

### (三) 空间赋能：从“城乡分化”到“适配发展”

空间赋能的核心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异质性。第一，推动人口收缩地区的“精明收缩”与“存量优化”。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成为老龄化率增长最快的区域，伴随着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和经济增长放缓[11][23]。对这些地区而言，继续追求人口和经济的“增量扩张”已不现实。应转向“精明收缩”策略：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动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盘活闲置的学校和卫生院等存量资产，将其改造为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第二，促进人口流入地区的“承载力提升”与“包容性增长”。珠三角、长三角等人口净流入地区，因年轻劳动力的持续流入而“稀释”了老龄化程度，但也面临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剧增的挑战。这些地区应着力提升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承载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第三，探索“适老型农业农村体系”。针对农村“先老、更老、空老”的严峻现实，应将“适老型农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17]。具体路径包括：保障老龄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防止其被工商资本挤出；发挥村社组织的统筹作用，解决分散经营与小农生产的弊端；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降低老龄农民的劳动强度。

### (四) 认知赋能：从“衰老恐惧”到“价值认同”

认知赋能的核心是重塑社会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的集体认知。第一，构建“大众传播-社区传播-家庭传播”三级传播网络。认知共识不会自发形成，需要系统性的传播介入[6]。在传播维度上，需从三个

<sup>1</sup><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10787/content.html>

层面协同发力：主流媒体应将涉老政策中的专业术语“转译”为公众易于接受的生活化表达，并同步开展老龄化国情教育；社区层面则可依托地缘关系与熟人网络，把“积极老龄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本地行动；家庭内部则借助代际沟通与日常协商，在亲情互动中逐步形成养老责任的共同认知。其次，依托“积极老年学”重构对老年价值的认知范式。传统老年学秉持“问题导向”，将老年人视作“负担”和“依赖者”；而积极老年学则聚焦“活力老人”，强调其拥有的“智慧资本”与“遗憾资本”实为社会发展的珍贵资源[19]。该理念的推广，有助于破除“衰老即衰退”的固化印象，促使“老有所为”从道德倡导升华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此外，弥合“数字健康鸿沟”、确保老年群体的数字权利，同样是认知赋能的关键环节——技术理应为老年人所用，而非将其排斥在外[21]。其三，借助代际对话化解认知对立。当前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老年人挤占资源”“年轻人不愿养老”等对抗性言论，其根源在于代际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与价值共识。为此，需要搭建跨代际对话机制，使不同年龄群体在平等互动中增进对彼此处境与诉求的理解，从而推动代际间“零和博弈”的认知逐步被“互利共生”的理念所取代。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转型为背景，系统整合了前沿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证了从“压力叙事”向“赋能治理”范式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面临总量负增长、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结构性错配、区域与城乡分化、社会共识缺失等多重复合型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传统“压力叙事”的经验基础。然而，传统“压力叙事”存在静态视角、忽略主体能动性、可能引发自我实现预言等内在局限，超越这一叙事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赋能治理”范式以赋权、激活、协同为核心意蕴，将老龄化从“外部冲击”重构为“转型杠杆”，其战略重构需从经济、社会、空间、认知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围绕“银发经济”与“长寿红利”两大主轴，实施经济维度的赋能策略：将银发经济定位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推动适老产品研发及智慧养老业态拓展；同时构建老年人力资本开发机制，健全老年教育网络与再就业服务支撑平台。其二，依托“家国协同”与“全生命周期”两条主线，推进社会层面的赋能进程：厘清政府、家庭与市场等多方主体的权责界限，巩固家庭在养老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并建立面向老、中、幼全龄人口的整合性福利支持体系。其三，运用“精明收缩”与“适老型农业”双重策略，落实空间维度的赋能安排：在人口缩减区域推行精明收缩方案，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农村地区将适老农业嵌入乡村振兴规划，保障老龄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益；在人口净流入地区则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其四，借助“三级传播网络”与“积极老年学”双向发力，深化认知层面的赋能引导：搭建三级宣教平台，系统开展老龄化国情教育；将积极老年学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培育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文化氛围。

## 参考文献

- [1] 朱紫陌, 胡鹏, 巴曙松. “十五五”时期中国老龄化程度与中长期人口发展态势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26, 48(5): 72-85.
- [2] 王萍萍: 人口总量降幅收窄 人口素质持续提升[EB/OL]. 2025-01-17.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5/2025\\_sjjd/202501/t20250127\\_1958518.html](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5/2025_sjjd/202501/t20250127_1958518.html), 2026-06-17.
- [3] 张卫峰, 赵启华.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供需驱动的双重视角[J]. 西北人口, 2026, 47(3): 56-70.
- [4] 范国斌, 谢可欣, 彭刚. 积极老龄观视角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再探讨[J]. 调研世界, 2025(11): 42-56.
- [5] 马岚. 从“福利追赶”到“福利重构”: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服务供给转型[J]. 江海学刊, 2025(6): 140-149.
- [6] 申琦, 蔡耀辉.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共识研究——基于公共传播视角[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5(4): 60-71, 2.

- 
- [7] 原新, 于佳豪, 金牛. 从增量到减量: “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特征及治理转型[J]. 治理研究, 2026, 42(1): 4-18, 158, 2.
- [8] 陈卫民, 任雨晴. 中国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J]. 人口学刊, 2025, 47(4): 82-97.
- [9] 肖周燕, 马昌群. 人口老龄化如何塑造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J]. 经济管理, 2025, 47(7): 44-64.
- [10] 王笑非. 人口老龄化对青年就业的结构性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 青年探索, 2026(2): 63-74.
- [11] 许昕, 赵媛, 周建芳. 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格局特征与作用机制[J]. 地理研究, 2025, 44(6): 1587-1599.
- [12] 胡湛, 孙昕. “何以战略”与“以何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J]. 人口研究, 2024, 48(5): 3-16.
- [13] 赵怀娟, 朱艳松. 老龄化研究新视角及其政策因应[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9): 1969-1971.
- [14] 南希·莫罗-豪厄尔. 生产性老龄化: 理论与应用视角[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6): 42-46.
- [15] 徐亚东, 林进龙, 张应良. 农村生产性老龄化: 理论阐释、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7): 63-82.
- [16] 穆怀忠, 孟婉荣, 陈曦. 人口老龄化、收入再分配与储蓄结构变动[J]. 中国软科学, 2025(6): 8-17.
- [17] 王海娟. 面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适老型农业视角[J]. 理论月刊, 2025(3): 124-133.
- [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HO.
- [19] 杨光钦, 赵南. 积极老年学: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学科需要[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2(3): 89-97.
- [20] 马志越, 李冠华. 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产业集聚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J]. 华东经济管理, 2026, 40(5): 1-10.
- [21] 罗梦凡. 生产性老龄化视域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问题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 大庆社会科学, 2024, (3): 119-123.
- [22] 原新, 于佳豪. “养老”转向与“为老”出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叙事逻辑[J]. 探索与争鸣, 2026(1): 47-57, 177-178.
- [23] 宋全成, 张倩. 数字时代健康老龄化的挑战及其路径选择[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4): 16-27.